

當代政治哲學導論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威爾·金里卡(Will Kymlicka)◎著 劉莘◎譯

當代政治哲學導論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威爾·金里卡(Will Kymlicka)◎著

劉莘◎譯

當代政治哲學導論

2003年11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580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著者 Will Kymlicka

譯者 劉 莘

發行人 劉 國 瑞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台北發行所地址：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

電話：(02)26418661

台北忠孝門市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1-2樓

電話：(02)27683708

台北新生門市地址：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

電話：(02)23620308

台中門市地址：台中市健行路321號

台中分公司電話：(04)22312023

高雄辦事處地址：高雄市成功一路363號B1

電話：(07)2412802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26418662

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責任編輯 莊 惠 薰

特約編輯 李 國 維

封面設計 胡 筱 薇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

ISBN 957-08-2640-1 (平裝)

聯經網址 <http://www.linkingbooks.com.tw>

信箱 e-mail: linking@udngroup.com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2e)

Copyright © 2001 by Will Kymlicka

Chinese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Linking Publishing Company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everley Slopen Literary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書中文譯稿透過彼岸出版策劃室取得

為政治尋找理性

——Will Kymlicka《當代政治哲學導論》中譯本導讀¹

錢永祥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金里卡(Will Kymlicka)《當代政治哲學導論》的中文譯本問世，基於兩個理由，我們應該重視與推介。第一，這是一本極為出眾的著作，問題意識精準明晰，論證結構緊密犀利，也涵蓋了豐富又紮實的內容，對當代政治哲學的全局發展提供了準確深入的介紹，值得一切對政治和哲學思考有興趣的人細讀。第二，政治哲學本身的發展，關係到政治究竟能不能成爲一種有理性可言的活動，值得社會上具有實踐意識的公民們積極涉獵，本書堪稱是他們最得力的入門津梁。

一、政治哲學的興衰

在今天，讀者會對政治哲學這個學術領域感到興趣，不能說是意外。這個時代，政治勢力所掌握的動員能力和資源，以及支配社會各個領域、各種活動的壓倒性優勢，堪稱睥睨古今，或許只有當年興建金字塔的政教權威稍能望其項背。可是今天的政治權威，在一個致命的方面，又享受不

¹ 本文的某些論點，在Isaiah Berlin, "Does Political Theory Still Exist?"(1961/62)一文中已見申論，合當在此注明。

到舊日政教權威的安逸：它已經無法藉助一套具有絕對威信的宇宙觀／價值觀君臨整個社會，鞏固自己的正當性。這種情況之下，一方面，政治權力的需索與控制無所不在，即使無意過問政治的人也無所遁逃，另一方面，政治權威的正當性所仰仗的原則與價值觀卻又捉襟見肘，不僅無法獲得普遍的認同，甚至於必須不時面對詰疑與挑戰。既然政治已經成為眾人的身邊事，而政治體制的正當性根據又眾說紛紜，那麼大家會開始注意政治哲學，希望透過哲學的探討，找到妥當的政治原則與政治價值，毋乃是很自然、正常的事。

這個情況，充分反映在學術浪潮的起伏演變上。在當前學術界，政治哲學是一個相當活躍的學術領域，西方世界固然如此，在台灣乃至於中國大陸，它也開始有所發展和成長。本書作者在書〈第二版序〉裏，驚嘆英語政治哲學界新創期刊的蓬勃景象，可以為一佐證。即使在台灣，近年也正有學者與民間出版機構合作，開中文世界之先河²，自行創辦了《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這份學術期刊，足以窺見這個學門的生氣。可是我們不要忘記，在1950、1960年代，政治哲學在西方曾經途窮路盡，甚至有人擔心它業已死亡。而在中文世界，「政治哲學」原本是無聲無息、乏人問津的一個學門；它成為研究主題、進入大學課堂、甚至藉著著作或者翻譯的形式進入書市，也不過是近10年才發生的新鮮事。

眾所周知，政治哲學在西方曾經有過輝煌的歷史。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的盛名固不待言，單就近代而論，17世紀的霍布斯、洛克，18世紀的盧梭、康德，19世紀的黑格爾、馬克思、約翰彌爾，都曾經撰述經典著作，共同界定了西方政治哲學的基本面貌，進而引導、影響西方(以及東方)歷史的進程與方向。可是到了20世紀中葉，這個曾經有過如此顯赫成就的領域，一時卻顯得虛脫羸弱無精打采，原因何在呢？

化繁為簡地說，20世紀的政治社會生活裏，有兩個特有趨勢，對政治

2 1996年在北京創辦的《公共論叢》，至今已經出版七集。它的宗旨看來也是一份政治哲學刊物，不過由於它以專題叢刊的形式出刊，在技術意義上不便算作期刊。

哲學的蕭條要負一些責任。第一方面，意識形態在20世紀國家化、政權化之後，在極權國家成為官方教條、在民主社會成為壟斷性的輿論主流、甚至成為熱戰冷戰的焦點，支配力量和僵化效果均為前所未見。思想一元化的趨勢一旦成形，針對政治原則和政治價值要作批判與評比，也就不再可能，政治哲學當然無所施展。另一方面，社會科學的聲望與勢力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快速膨脹，逐漸構成公私領域「治術」的一環，於是循因果、結構與功能角度(甚至以統計的相關為已足)說明社會政治現象蔚為風氣，取代了規範性與評價性的取徑。進一步，從社會科學的「科學主義」角度來看，由於評價之舉似乎總是陷身在主觀、相對的泥沼中，而科學則可以得到客觀、確定的結論，甚至產生明確的政策以資治理社會(委婉的說法謂之「服務社會」)，那麼關於制度安排、政策選擇的思考與決定，當然也不容政治哲學置喙。

論者有謂，一直要到1971年羅爾斯《正義論》(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1971/1999)一書出版，20世紀西方才產生了一本足以與上述思想家並列的經典著作；在本書中，作者也視羅爾斯這卷巨著為當代政治哲學一切爭論的原點(ground zero)。表面看來或許屬於巧合，但是1970年代初期，正好也是西方社會開始檢討冷戰局面、批判既有學術格局與社經文化體制的高潮。閘門一旦打開，老舊意識形態的僵峙逐漸鬆動、各種社會議題逐漸暴露、弱勢群體開始發出聲音，西方社會——尤其是美國——一反先前瀰漫的同質化與自滿姿態，進入了一個以質疑、對抗、解放為主調的多元時代。羅爾斯的著作能夠贏得規模驚人的迴響與矚目，就時代精神而言，應該不是偶然。

在台灣，政治哲學能夠萌芽，也受惠於類似的歷史轉折。在黨國主宰社會的年代，台灣雖然有一些零星的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不過並沒有所謂的政治哲學探討。異議的聲音誠然依稀可聞，但是要對政治原則與價值進行批判性的反省，就那種封閉的環境來說，顯然太過奢侈。一直要到1990年代，到了解嚴之後，台灣社會面臨政局的動盪、體制的紊亂、權力鬥爭

的激烈、尤其是族群與身分的掙扎撕鬥，在一片喧囂聲中，政治哲學才開始有存身的可能。可以想像，隨著政治經驗的累積，隨著政治課題從簡單粗暴的敵我鬥爭，被迫轉向複雜細緻的合作共存，台灣社會對於政治的理解和期待，必須相應地有所調整。這個局面裏，政治哲學將不得不承擔更積極的角色。

如果是這樣，我們對政治哲學的思考角度和論證途徑，就需要有更深入的理解。

二、一本傑出的教科書

過去30年間，英語政治哲學以羅爾斯《正義論》為基礎，在西方學界發展與茁壯，進而引領、灌溉社會上的公共討論，構成一段深刻、豐富的哲學故事。加拿大學者金里卡立志講述這個故事，於1990年出版本書的第一版，甚受好評。如今第二版大幅度地擴張了章節篇幅，並且由劉莘先生譯成中文，有興趣的讀者總算找到了一位可靠的導遊。這本《當代政治哲學導論》自稱教科書，可是我們要知道，它是一本很特出的「教科書」。它的學術水平、以及可望提供給讀者的助益，都超過了我們平常對於教科書的期望，即使浸淫已久的教師和學者也可以受惠。確實，書肆中不難找到類似的導論書籍，不過恐怕沒有哪一本書像本書一般，深入地呈現當代政治哲學的活力、複雜與廣闊，同時又生動地反映了學院政治哲學與歷史、社會現實結合的趨向。

一般而言，教科書旨在引導初學者進入一個領域，總會力求系統與客觀地報導現狀，結果往往變成靜態地展示一幅解剖圖，五臟俱全、羅列有序，獨獨不見了其間生機運作的搏動。打開本書目錄，作者將當代主要學派分章陸續交代，似乎正好落入一般教科書的這種窠臼。可是如作者所言，他認為當代政治哲學的學派雖多，卻都在處理幾個共通的問題、面對同樣的現實，從而也就有一個根本的問題意識貫穿其間。問題與環境既然共通，各個學派之間的對話與互動也就格外頻繁緊張。本書章節的推進，其實可

以看作一系列接續不斷的辯證攻錯，對於該一根本問題應該如何陳述、理解、以及處理展開論爭。這種綿密起伏的爭論狀況，確實是當代政治哲學的實況。本書有意識地去反映這種實況，是它的第一個優點。

其次，教科書爲了保持客觀，往往不願意對於所介紹的各家說法表示太多的臧否意見。就政治哲學而言，這個態度容易坐實了一個流行的誤解，就是認爲政治思考純粹是立場的表達，而政治立場本質上屬於主觀意見，只有是否同意其結論的問題，至於論證本身的周全與對錯，並不是需要深究的。等而下之的教科書，遂不免充斥著條列「某主義 / 某思想家主張……」的陳套，彷彿各家主張都一樣妥當，結果學說取代了思考，原則淪爲牙慧口號。但是本書不然。在書中，作者不吝針對各家說法進行嚴密的分解，檢討其間的疏忽與矛盾，追究論證的一貫與完整。換言之，這是一本以哲學「實作」的方式介紹政治哲學的教科書，讀者不僅可以認識「學說」，更可以目睹學說背後的思考運作與批判門徑。作者本人在當代政治哲學界便是一位場子上的人物，立場明確(即所謂「平等主義的自由主義」)，在幾個題目上也卓有建樹。由他來著手品評當代各家的長短得失，無妨看作示範演練，不時可以見到精彩之論。

第三，本書還充分反映了當代政治哲學的一大特色，即理論與現實的密切關連。政治哲學本質上必須就著時代、社會的是非議題——並且通常涉及大是大非——發言，自古即無例外。因此，雖然當代一般哲學的學院化、抽離化趨勢不時遭人詬病，不過，就政治哲學而言，即使它想隱遯到最客觀、最抽離的概念分析，也無法擺脫介入爭議與表達態度的宿命。過去30年間，在東、西方社會，都有許多潛伏已久、或者新近生成的議題挑起了公共議論，令政治哲學受到深刻的衝擊與啓發，相應也有獨特的回應與反省。可以說，學院政治哲學與社會現實議題的相互滲透，目前正處於高峰，並且不可能退潮。本書作者本人在這個環境裡成長，他的學術工作與學術關懷，也在這個氛圍裏成形，所以他所敘述的故事，基本上可以看作政治哲學這個學門，對於西方幾十年來重大社會政治爭議的回應。讀者

會注意到，書中對每一套政治理論的探討，都以該理論的「政治」——即政治意義與可能促成的政策——結尾，是教科書中很罕見的寫法，適足以彰顯政治哲學與現實政治的密切關係。

當代政治哲學的這種實踐取向，是它一項值得特別注意的特色。這項特色提醒我們，關於社會與政治的思考，原本就有其由價值意識引導的實踐一面，政治哲學的本質如此，它在當代文化環境裏的發達與困局也繫於此。針對這個問題，我們可以稍作反省。

三、政治哲學是甚麼？

哲學所關心的，可以總結為「我應該相信甚麼」和「我應該做甚麼」這兩大類分別涉及認知與實踐的問題。不過，面對這些問題，哲學的主要責任倒不在於提供實質、具體的答案，告訴我們去信任這種或者那種知識（例如應該相信感官知覺、還是理性推論），或者去根據這種原則或者那種原則行動（例如應該追求最有利的後果、抑或不必理會結果而是嚴格遵循規則），而是追問：一種有關知識性質或者行動原則的主張，因為甚麼理由才是「對」的或者「好」的，是應該相信或者遵從的？在這個意義上，哲學乃是一種後設性兼評價性的思考：面對一個問題，與其說哲學要提供實質的正確答案，不如說它更關心這個答案為甚麼是「正確」的、是應該認可的、是講理的人所不得不接受的。

哲學接連上政治，管道即在此。在政治領域，一個極為根本的問題，就是要求對各種現實的（或者理想中的）體制、政策進行排比評價，做出好、壞、對、錯的分辨。即使最功利現實、最講求機巧策略的政治人物，只要他還需要為自己的作為找理由（所謂找理由，當然就是認定所找到的理由是「對/好」的），就不得不介入這種涉及比較與評價的思考。評價當然需要標準，標準就是各種政治原則與政治價值。可是這些原則與價值為甚麼是對的？是大家應該接受的？是政治制度與政策之所以成為「正當」的好理由？這些考量，構成了政治哲學的核心議題。

西方古典政治哲學，不僅界定了這個核心議題，處理這個議題的方式也有其獨特處。一般而言，古典政治哲學預設了人的生命有一個應然性的目的狀態，或者來自本性(自然)、或者來自某種超越的旨意(天、神)，代表一種終極的理想目標，人的完成(perfection)在焉。政治生活在人生裏有其位置，正是因為政治生活跟達成該一目標有某種特定的關係。在這樣的思考架構裏，政治體制、政治價值的正當性，可以由政治生活與該一目標的關連導出。古典政治哲學的任務，即在於發現這種關連、進行這種推導。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奧古斯丁的哲學和政治觀點雖然迥異，卻都體現了這個思考架構。簡單地說，這是一種用「目的」來檢討政治體制與政治價值的思考架構。目的論式的思考要有說服力，當然取決於它所標舉的目的狀態能不能取信於人、是不是算是對的。而目的狀態的說服力，又取決於有關人的天性或者超越的旨意的說法，能不能取得說服力。不過，目的論的實踐性格，是很明白的：以它為典範的政治哲學，始終關切著政治與人生的價值關係。

到了近代，這套思考方式逐漸喪失力量。近代人不再用目的論的角度去思考政治問題，因為近代人不再敢預設一個明確、客觀、完美的目的狀態，具有無可置疑的權威，可以直接回答政治領域裏的評價問題。奠定近代政治哲學基礎的霍布斯，一口斷言沒有所謂的終極目的或者最高善可言，人的幸福不過在於慾望的不斷滿足。而慾望所指，自是由個人自行判斷的。我們不必接受霍布斯的極端說法，不過到了今天，事實上人類已經沒有理知資源，去主張一套完美的目的狀態；人類在利益、理想、與認知上的多元化，事實上也已經無可挽回。不敢面對這樣雄辯的歷史事實，甚至妄想加以改變，當然有失政治哲學的切事踏實職責。

但是在近代，哲學的評價責任並沒有解除。隨著目的的個人化與主觀化，政治哲學如果還想善盡原先的評價職責，勢必需要另闢蹊徑，改而訴諸程序：政治體制與政策，無論其建立的方式、或者其運作、分配的方式，須要在程序上滿足某種標準，即使人們各自的目的與利益不同，卻都會同

意這些制度與政策是對的。可以想像，要找到並證明這種關於程序之正當的標準，並不是很容易的事。近代政治哲學的複雜、豐富與多樣，盡在於此。但我們會發現，這種從目的到程序的轉折，並沒有改變政治哲學對於政治與價值之間關係的關切。

四、政治哲學與自由主義

以上所言似乎表示，到了現代，政治哲學陷入了一個難局。一方面，它存身在一個價值與認知都日益多元化的環境中；它不但不能逃避這個環境，其實它本身便需要這種環境才能生存。另一方面，它又需要找到能夠獲得普遍接受的標準，以便對於政治制度和政策提出評價。這兩方面的要求，不是有些矛盾嗎？

前面提到，近代政治哲學只能以程序為著眼點，迴避這裏可能的矛盾；以程序意義下的正當性，保證評價標準的正當性。可是「程序正當」這個概念，在加以分梳之前，意思並不是自明的。舉例而言，倘若我們肯定了種族主義的正當性，事先使用種族之間不平等的位置來界定他們的互動程序，那麼不同種族之間許多不堪聞問的壓迫關係，極可能都是符合程序正當標準的。

種族主義當然違反我們今天的道德直覺；可是你又如何確定，我們今天的道德直覺沒有類似的其他盲點與成見呢？其實，當代政治哲學所採取的程序觀點，並不是僅僅涉及形式意義下的程序，而是更帶有一些明確的價值認定，其目的即在於預防類似的盲點。這種價值認定，套用本書作者的話來說，可以表達為「所有人(以及某些動物)的利益都應該受到平等的考量」。讀者讀進本書不久，就會發現，「如何才算是對各個主體的利益作平等的考量」，構成了本書最佔篇幅的主題，也是作者眼中當代政治哲學的核心議題。這項價值認定，為當代政治哲學各家所接受，從通稱的左派到通稱的右派皆無例外；各家的差異，完全來自大家對於這項認定有不同的詮釋罷了。

一旦我們澄清了當代政治哲學用程序觀念所肯定的價值認定，就能了解為甚麼當代政治哲學似乎很難擺脫自由主義的論述架構。簡言之，當代政治哲學肯定了個人的抉擇自由(因此價值多元)、個人的道德地位平等(因此每個人的利益同等重要)、以及制度須公平地對待個人(因此才能既尊重自由而又維持平等)，而這些價值，乃是在自由主義這個歷史性的論述裏才能同時並存的價值。如果本書的自由主義大架構令讀者感到不自在，甚至懷疑作者的公正客觀，居然將放任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社群主義、多元文化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等等旨在挑戰自由主義的學說，也套進自由主義的架構來陳述批評，讀者應該追問當代政治哲學本身，為甚麼必須以自由、平等與公平三項價值作為政治思考的基本參數(parameters)，發展各家的理論。我想，政治哲學之所以必須在這套架構裡工作，並不是因為自由主義具備了甚麼絕對的、普世的正確性，而是因為這個時代與文化已經設定了——接受了——這幾項根本價值。你盡可以對它們提出與眾不同的詮釋，卻無法全盤否定或者放棄它們。

像這樣的價值意識，距離古典政治思想已經很遠了。可是用這樣的價值意識去對政治體制和政治價值進行評價，卻是常青的問題。本書各章，分別探討各家對這些價值所提出的不同詮釋、檢討各家眼裡落實它們的時候所要倚靠的制度。終極的答案分明沒有出現；坦白說，在人類歷史的有限條件之下也不太可能出現。不過這個冗長繁複的追尋過程，已經使我們更清楚這些價值在制度與理論上的涵蘊。這些認識，將是政治哲學繼續發展的動力。

五、結語：追求政治理性

最後我要提醒讀者，在今天，並不是沒有人在懷疑政治哲學是否有其可能。畢竟，哲學自許為一種說理的活動，而政治則以權力為關注的焦點。莫怪乎有人說，權力容不下哲學的說理，因此所謂「政治」加「哲學」，乃是一種不可能的組合，註定流為學院裏的袖手清談。果然，保守派指責這

種清談縱情於某種抽象的普遍理性，破壞社群傳統、顛覆原有的倫理秩序；激進派指責這種清談蹈空編織一套美好的理想，企圖掩飾現實中的壓迫關係、癱瘓人們的反抗意志；政治人物則指責清談誤國僨事，妄想用道德規範取代權力的獨特邏輯，若非幼稚即屬傲慢。換言之，政治哲學受到懷疑，是因為保守派、激進派、實務派殊途同歸，一致地懷疑理性在政治領域是否適用、政治理性是否還有存在的可能。

這是一個真實、棘手的問題，在此無法深入討論。畢竟，我們這個時代和文明，在虛無與縱欲之間擺盪跌撞已經有了一段時間，連「政治理性」這個概念本身都已經顯得靦腆生澀了。但是回顧之下又可以發現，在虛無的時刻我們無所信仰，現實權力自然成爲人間的最高權威；在縱欲的時刻我們認真地信仰，現實的權力僭稱道成肉身，依然發揮著權威的功能。因此我們不能不問：權力之外有更高的權威嗎？權力可能受到理性的節制嗎？

答案其實不用遠求。如果政治理性的要求，即是用說理去探討政治原則、政治價值，用說理的方式對政治體制與政策進行對錯好壞的評價，那麼落實政治理性，不外乎就是讓政治本身產生一個說理的動力，讓權力承認說理的必要性。制度上，這要依賴公共領域。觀念上，這需要將政治帶向公共化的方向。可是政治理性本身的重建，也就是發展說理與評價的資源與能力，關鍵的助力應該來自政治哲學。在這個節骨眼上，與其奢侈地懷疑政治哲學的可能，讓政治淪落爲非理性力量的芻狗，不如正視當代政治哲學的諸多見地與反省，試著給政治理性一個發展的機會，或許才是更積極、更踏實的態度。

2003年仲秋於南港 / 汐止

第二版序

這本書的頭版是我剛從研究生院畢業後寫就的。那時，我感到不解的是，為什麼有多年教學經驗和研究積累的年長同行們寫就的政治哲學教材為數並不多。

12年之後我才意識到，只有那種激情洋溢並對自己新形成的所學所思過於自信的研究生，才會想到要寫這樣一本雄心勃勃的著作。我當時撰寫本書確有兩個抱負。首先，我想為當代英美政治哲學中最重要的那些理論提供一個合理的綜合概述。其次，我想要展現各種理論之間的內在聯繫。我想要表明的是：每一種理論都可被看作是在思考一些共同的問題，每一種理論都是對先前的理論所具有的弱點和局限進行的回應；於是，隨著該研究領域的擴展，我們就可望看到貫穿於其中的進步。

現在看來，這兩種任務的抱負似乎有些過高。予以綜合概述的第一種任務在當時都很有可能是不可現實的，而隨著過去10年政治哲學領域的大量論著的誕生，該任務變得甚至更加困難。其中的一個標誌就是政治哲學領域的期刊的突飛猛長。當羅爾斯在1971年出版他的《一種正義理論》(*A Theory of Justice*)——我把該書當做論辯的起點——的時候，只有《倫理學》(*Ethics*)這樣一本生命力多少有些枯竭的期刊在關注政治哲學。而當我開始撰寫本書第一版的時候，有一些新創刊的期刊已經在伴隨重新煥發了生命力的《倫理學》——譬如，《哲學與公共事務》(*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和《政治理論》(*Political Theory*)。今天，我們已經看到了另一輪新期刊的

誕生，包括：《政治哲學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國際社會與政治哲學的批判評論》(*Critica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政治意識形態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我們也已經看到了在政治哲學領域的新叢書的誕生——其中最著名的是牛津大學出版社的《牛津政治理論》叢書和劍橋大學出版社的《當代政治理論》叢書。

簡言之，與以往任何時候相比，目前有更多的人參與到政治哲學的研究領域，也湧現了有更多的文章和著作。這些著作和文章絕非只是舊有立論的精緻化，它們探討的話題在1970和1980年代都還未曾出現——譬如，文化多元主義和審議式民主。

我顯然不可能囊括所有的學術文獻，也沒能按最初所想的那樣寫成一本面面俱到的綜合導論。事實上，我有時也在想，我們也許需要對政治哲學領域予以全新的介紹——譬如，用重點研究來代替全面綜述，或者，更側重於方法而非實質性理論。

然而，我卻承認自己對這本書的喜愛，並且願意認為，本書能夠把那些我認為極重要的思想介紹給這個領域的新讀者。我認為仍然需要對該領域予以盡可能的綜合介紹。

爲了能夠綜覽全局，爲了決定要把哪些內容放進這個新版本，我做出了困難的選擇。我自己一直致力於研究公民資格的問題，而我認為這是自1990年代以來最富有成果的論域之一。事實上，一些評論家甚至說過，「公民資格」是1990年代的行話，正如「正義」是1970年代的行話，「共同體」是1980年代的行話。因此，我爲第二版增加了關於公民資格的兩章新內容。新增的第一章集中論述的問題是：公民們必須展現怎樣的技能、德性和行爲，才能使民主政體保持高效、穩定和正義。雖然很多思想流派都曾涉及過這個問題，但它卻是在公民共和主義的強有力的思想衝擊下凸顯出來的；並且，它也構成了新近的對公民德性、公民教育、公共理性和審議式民主進行解釋的基礎。

新增的第二章集中探討公民資格與團體差異之間的關係。公民資格常常被認為是我們所有人都應該擁有的地位或身分，但許多團體卻通過某種形式的「差異的政治」或「承認的政治」來尋求對自己獨特身分的法律和政治承認。這個問題是在文化多元主義者的強有力的思想衝擊下呈現出來的，但它也提出了更一般的問題——個人與團體權利、民族主義、種族主義、移民以及團體代表的關係的問題。

這些並非1990年代湧現出來的全部重要問題。我特別感到遺憾的是，就我們對環境和動物的道德責任的日益激烈的論辯，沒有專門的一章來加以探討。而這種論辯涉及到了我們關於政治道德和政治共同體的性質的基本預設¹。但我希望關於公民資格的這兩章新增內容，與前些章的最新的縱深論述結合在一起，可以為讀者提供一個縱然不是絕對完整的、但卻相當有價值的對當代政治哲學的綜述。

如我所述，本書頭版的第二個抱負是：澄清後來的理論在什麼意義上既吸取了先行的理論的成果又彌補了前者的缺陷。由於政治哲學領域的話題和立論越來越呈現出多樣化，這個任務在今天看來也更加複雜。要為該領域內的各式各樣的進展找到一致的邏輯和 述方式來予以統一的解釋，或找到衡量「進步」的統一尺度，現在看來也越來越困難。

事實上，由於立論的日益多樣化以及每一種立論都有專屬於它的術語和關注的內容，似乎當代政治哲學只是各不相同的立論或論辯的沒有內在聯繫的匯總——每一種立論都按照自己的內在邏輯在發展，都與政治哲學的其他領域無關。過去十年的各種新理論的令人頭暈目眩的展示，似乎只是加深了零碎和混亂的感覺。

然而，我卻認為理論與術語的增長可能會遮蔽這樣一個事實：所有的

1 例如，考慮一下重要的「類人猿項目」(Great Ape Project)——要把某些基本「人」權推廣到類人猿的國際運動(Cavalieri and Singer, 1993)。關於擴展道德共同體並使之包含非人動物的一般問題，參見DeGrazia, 1995; Regan 2000。關於環境的道德地位的論辯，參見Eckersley, 1992; Dobson, 1990; Zimmerman, 1993; Goodin, 1992a, De-Shalit, 2000。

政治哲學家一定是在現代生活的特殊需求、願望和複雜的現實背景下對付一些共同的難題。理論家們就如何闡釋這些難題和現實存有分歧，但如果不在意他們面對的共同問題，我們就將誤解這些不同理論的意義與目的。而我們一旦明白了這些理論的共同目標，我們也就可以就這樣一個問題——是否在實現這些目標的道路上確有進步——開始形成自己的判斷。

我實在難於理解的是，如果有人不認為我們可以在那些問題上取得進步，他們為什麼還要從事政治哲學的事業。由於我認為對進步的期望對於該項事業至關重要，我就沒有遮掩自己的做法：我試圖闡明在哪些情況下後來的理論對那些共同難題予以了不僅異於而且優於先行理論的解決方案。

那些各不相同的理論究竟在涉及哪些共同主題或難題呢？我在第一版中強調的一個主題就是：每一種理論都可被視為是在對這個立論——政府要「平等關照和尊重」公民——的意義進行闡釋。我在「導言」中對這個主題予以了詳盡的討論，在其中我也討論了它如何使我們評價相互競爭的理論，在此就不再重複。

但在第一版中還有兩個不那麼明顯的共同主題，而我在這一新版本中試圖把它們更強有力地凸顯出來。第一個主題是自由主義民主在當代政治哲學中的中心地位。極簡略地講，我們可以說，當代政治哲學家分成了兩個陣營。一個陣營的哲學家支持自由主義民主的基本信念，他們關心的是如何為這些價值提供最好的哲學捍衛。到目前為止，有三種主要的捍衛自由主義民主的立論：功利主義，自由主義的平等，自由至上主義。這三種立論共同確定了英美自由主義民主傳統中的政治論辯的言說方式。與這三種立論聯為一體的概念——「權利」、「自由」、「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平等機會」——不僅在理論層面而且在實踐層面左右著政治論談。的確，這些理論的支配力是如此之大，以至於一些人甚至認為它們提供著「在我們的公共領域唯一使人在道德上信服的政治話語」（Grant, 1974: 5）。

本書第二、三、四章分別評估了這三種為自由主義民主進行捍衛的、